

# 略述“美好生活”印第安理念在拉美的 制度实践与挑战 ——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为例

韩 晗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 “美好生活”理念发端于拉美印第安传统文化。追根溯源,近代以来,随着拉美国家普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消费主义”观念与印第安传统理念间的文化冲突接踵而至,社会矛盾随之激化。对此,曾被视为社会“问题”的拉美印第安裔人民,提出用“美好生活”传统民族理念解决现代的问题,即:通过人类共同体中内部与外部的多种平衡与和谐,来实现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富足。历史上,这一理念在安第斯地区印第安人社会中,获得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当代,拉美部分安第斯国家在治理中融入了传统原住民哲学“美好生活”这一理念,践行到立法与公共政策制度等建设中来。未来,拉美国家探索“美好生活”的进程,仍充满诸多挑战。

**〔关键词〕** “美好生活”; 基本权利; 宪法; 拉丁美洲; 印第安文化

**〔中图分类号〕** D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9) 01-0040-09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9.01.004

特殊的历史路径,让当代拉丁美洲地区成为世界上人口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印第安各民族人民杂居于此。在前哥伦布时期,拉美以“印第安文明”为主体,主要包括: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等。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误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并将此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即“印度子民”之意,这实则是对拉美原住民的历史性误读。后经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这一误读沿用至今。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殖民拉美的过程中,大量奴役甚至屠杀印第安人,造成人口的骤降与部分族群的灭绝。相较近200年的地区国家宪政历史,印第安人实际上重获基本权利保护的时间却不足50年。随着印第安文化重获应有的尊重,“印第安人”这一错误代称问题,渐获理解。

然而,对印第安理念的认同才刚刚拉开帷

幕。民族理念的传承与发展除了需要一定的人口基础作为支撑,更有赖于哲学内涵的充盈,印第安文化的崛起离不开拉美国家对其理念的认同。曾被誉为“影子”的印第安文化,<sup>[1]</sup>今天登上了拉美甚至世界的舞台。最佳的例证莫过于印第安传统理念“美好生活”作为后发展主义的“新”观点,纳入西方理论的博弈进程。“美好生活”理念主张通过在不损害他人(物)的前提下,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实现人们精神与物质的富足。

今天再度审视拉美国家“美好生活”理念,恰与中国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2017年8月,玻利维亚艾马拉族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马马尼(Fernando Huanacuni Mamani)访华并以《“美好生活”——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

**〔收稿日期〕** 2018-06-01

**〔作者简介〕** 韩晗(1985-),女,北京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古巴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拉美政治、法律及印第安文化等问题。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55)阶段性成果之一。

式中, 人们与帕恰妈妈 (Pacha Mama)<sup>①</sup> (即土地) 的相处模式是掠夺和破坏; 而印第安各民族的理念——“美好生活”, 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平衡。与资本主义社会推崇个人主义相比, “美好生活”理念倡导共同保护“帕恰妈妈”。这种将土地誉为母亲的理念, 亦是对倡导关注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有力诠释。这一理念,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 习近平主席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7年,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再次强调: 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无疑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

对“美好生活”理念的宣传, 为提升印第安人文化提供了关键性帮助。更重要的是, 通过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实践, 提升对印第安人的经济、社会等基本权利的保护。“美好生活”所倡导的“人类—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模式, 已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落地深化为立法 (地区国家通过修宪将帕恰妈妈视为权利保护主体) 的行政实践。拉美“美好生活”理念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向前发展, 能否应对诸多理论与实践的挑战, 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自信与国际“话语权”建设又有何种影响?

## 一、摆脱西方中心论、重提“美好生活”理念

当渐成体系的西方哲学获得世界性广泛认同时, 如何理解异于西方的民族文化认知, 是值得学者深思的问题。拉美国家对土著印第安人“美好生活”理念的深化与再读, 尽管在地区内

部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获得了一定认可, 但对于达到民族学、政治学领域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而言, 仍有完善的空间。本文尝试在西文文献基础上, 解释“美好生活”的本意, 剖析两个拉美多民族国家在立法、行政实践中转化运用传统理念的经验和教训, 致力于为中国协调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提供参考。

“美好生活”理念是建立在特定人口文化基础上的理念, 他们是地区的原住民, 具有地区代表性。拉美地区的印第安民族众多, 随着对印第安人口界定的不断明晰, 整体规模与统计数据在不断完善。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统计: 拉美地区印第安人口数量不到 4480 万人, 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总人口的 8.3%。地区约有 671 个 (2006 年) 被直接承认或被国家相关政策认定的民族。其中, 29 个位于非西语的加勒比地区 (具体分布情况: 3 个在伯利兹、6 个在法属圭亚那, 9 个在圭亚那, 11 个在苏里南); 另外 642 个民族分布于拉美地区国家。根据参与地区活动情况来看, 拉美存在民族为 826 个。<sup>②</sup>经过 500 多年的发展, 当前印第安人口规模, 刚刚接近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地区人口。<sup>③</sup>印第安各民族人口在各国人口构成亦差异较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1 年数据显示, 厄瓜多尔印第安人口约占总人口 7%, 主要印第安民族为克丘亚族、艾马拉族等。在拉美国家中, 厄瓜多尔实现了较为完善的印第安人保护制度的建设。玻利维亚是拉美地区印第安人口占比最高国家, 印第安人口数量约为 620 万人。印第安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62.2%<sup>④</sup> 包括多数民族艾马拉族、克丘亚族, 以及 43 个其他少数民族。<sup>⑤</sup>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 是该国首位印第安裔领袖。此外, 墨西哥拥有 1700

<sup>①</sup> 在很多译文与理解中, Pacha-Mama 被解释为“大地母亲”, 但实际上帕恰妈妈不仅是“大地母亲”。它来自印卡文化, 在克丘亚 (Quechua) 语中 pacha-mama 意为“自然母亲”。这个由两个单词组成的词汇代表了我们是土地的子孙, 信者们相信她是神明的恩赐。mama 一词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最早且最容易习得的单词, 在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以及克丘亚语中发音惊人地相似。在 Runasimi 语中, mama 是母亲的意思, 这一点没有疑义, 但在表示我们脚下的土地、种植的田地的意思时, 代替 pacha 的却是“Hallpa”一词。因此在 Runasimi 语中, 为世人所熟悉的“大地母亲”应写为“Hallp'amama”。帕恰妈妈在印第安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 赋予了印第安人对自然的感恩与敬爱。神话中, 印第安人所尊崇的太阳神通过他的光芒使他的妻子帕恰妈妈孕育了果实, 被太阳照耀的大地肥沃富饶, 把丰收带给人们。因此, 在南美洲安第斯中部地区, 帕恰妈妈成为了印第安人的伟大神明。印第安人认为帕恰妈妈, 这位自然母亲并非定居在特定地区, 而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具有宇宙性。“帕恰妈妈”这一词汇中的 Pacha 有着超越土地的内涵, 它具有时间-空间的双重含义。没人能脱离这一时空及这一现实。也就是说, 没有人置身于 Pacha 之外。基于如上认识, 今天的人们进一步发展了该观念。太阳能带来的热能与光能维持着我们的生活, 土地中的果实供我们繁衍。因此, pacha 这一具有时间-空间意义的传统单词实际意味着一种近乎于妈妈的角色, 为人们带来物质、能量与精神食粮, 因此称之为: Pacha-Mama (宇宙母亲或者说是时空妈妈)。——转引自韩晗《从电影〈观鸟者〉看全球化进程中的拉美印第安文化》。

<sup>②</sup> 参见: 拉美经委会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网站。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3187/S1600364\_es.pdf?sequence=6&isAllowed=y, p139 访问时间: 2018 年 9 月 14 日。

<sup>③</sup> 参见: 拉美经委会 (CEPAL) 网站。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3187/S1600364\_es.pdf?sequence=6&isAllowed=y, p135. 访问时间: 2018 年 9 月 14 日。

<sup>④</sup> 数据来源: 拉美经委会。https://celade.cepal.org/redatam/PRYESP/SISPP/Wehhelp/porcentaje\_de\_poblacion\_indig.htm, 访问时间: 2018 年 9 月 14 日。

<sup>⑤</sup> 数据来源: 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https://www.ine.gob.bo/index.php/principales-indicadores/item/258-la-autopertenencia-de-la-poblacion-boliviana-que-se-declara-ser-parte-de-las-naciones-y-pueblos-indigena-origenarios, 访问时间: 2018 年 9 月 14 日。

万印第安裔人口，是地区拥有印第安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巴西拥有 305 个印第安民族，是拉美民族数量最多的国家。印第安民族和人口在拉美地区的广泛分布是“美好生活”这一理念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个基础是地区近代发展理论研究的发展。

纵观近当代主要发展理论进程，拉美地区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重地。1949 年，时任美国总统哈利·S·杜鲁门在第四点计划中提出“不发达”概念，“意在”让欠发达国家认识到失败的内部原因。1961 年，W. W. 罗斯特提出了现代化理论，该理论推动了各国关于发展本源问题的探讨。1972 年，在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为什依附理论的基础上，费尔南多·卡多佐与恩佐·法莱图进一步提出，依附状态与发展可以共存。他们关注外部因素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更为客观地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霸权思维与公平发展之间的博弈并未就此止步。1974 年，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提出，从世界而非国家的视角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 2009 年指出，对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巨大的世界金融危机，唯有通过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办法才能根本解决。这些观点无疑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卷入资本主义旋涡中。这一形势随着同期后发展理论的崛起，有所好转。该理论提出探寻区别于传统发展观、更好的国家发展路径问题。古斯塔沃·艾斯特巴和阿图罗·埃斯科瓦尔(Gustavo Esteva y Arturo Escobar) 等拉美理论学家，是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埃斯科瓦尔将“美好生活”作为基于印第安传统哲学的后发展主义新理念。与强调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生活得更好(better live)”理念不同，“美好生活”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诸多哲学关系的思辨，是千年来众多印第安民族创造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

认识“美好生活”在不同民族的表达差异与传统理念共识，是明晰这一思想当代内涵的前

提。今天，各印第安民族既有聚居于一个拉美国家的，也有分布于多个拉美国家的，同民族不同分支的民族文化也不尽相同。目前，地区拥有本民族语言、且语言使用人口超过百万人口的民族，主要包括：艾马拉、克丘亚、瓜拉尼、玛雅和那瓦特等族。本文仅以艾马拉和克丘亚民族语言中的“美好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艾马拉语中“Suma Qamaña”，原意指“知道生活的人”。民族宇宙观<sup>①</sup>中，“Suma Qamaña”代表了“富足、完满的物质和精神生活”。<sup>②</sup>在克丘亚语(Kichwa、Quechua；或称如纳西米语<sup>③</sup>)中，“Sumak Kausay”表达了以存在体现本质，追求崇高而富足生活的民族理念。<sup>④</sup>民族语言对“美好生活”的表达虽存在差异，但平衡与和谐理念是印第安宇宙观的哲学共识。在多领域的横向发展中，人们应追求所有人、所有事物的和谐共存。在共存(社会)中，人们应关注所有人、周边环境(包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整体的平衡。在时间的纵轴上，印第安民族哲学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人类本身或个人财富，而是实现生命过程的物质富足与精神满足。总的来说，“美好生活”的基本核心，即生活得美好，是在不损害他人和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共赢的发展。

基于此，当代学者进一步探讨了“美好生活”的现代意义。综合人类学内外视角看，地区学者，尤其是印第安裔学者对此有较深的第一视角研究。拉美学者路易斯·马卡斯(Luis Macas)率先提出：将“美好生活”作为(异于西方理念的)新生活模式，在地区国家和地区外部进行实践。厄瓜多尔克丘亚族领导人曼努埃尔·卡斯特罗(Manuel Castro)作为公民社会群体的代表，进一步明确了“美好生活”的要义为和谐的共同体共存。此外，非印第安学者，拉美后发展理论家阿尔贝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首先在厄瓜多尔提出“Sumak Kawsay(美好生活)”是一种政治思想，将其定义为打开民主社会建设大门的关键。他将“美好生活”与社会主义理念相结合，为今后厄瓜多尔发展“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利

① Jaya mara aru 为艾马拉语，意为“原初时刻的语音或单词”。

② Jaqiaru 为艾马拉语，意为“人们的语音、单词”。

③ 如纳西米语(Runa simi)：克丘亚语中，对自己语言的称呼，Runa Simi。其中，runa 意为“人”，simi 意为“语”。可理解为：人的语言。是今天印第安克丘亚语的前身，属印第安语中古老的一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4500 年前。参见：[http://www.concept-global.net/es/andino/impotancia\\_runasimi.html](http://www.concept-global.net/es/andino/impotancia_runasimi.html)。

④ Fernando Huanacuni: “Vivir Bien/ Buen Vivir, Filosofía, Políticas, Estrategias y Experiencias Regionales”, TRANSICIONES HACIA EL VIVIR BIEN o la construcción de un nuevo proyecto político en el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Publicado por el Ministro de Culturas del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P129.

时神父、学者弗朗索瓦·浩达 (François Houtart), 曾参与拉美国家的“美好生活”政治实践, 他结合地区经验, 从联合国“人类共同福祉”出发, 通过比较研究赋予了“美好生活”以国际性研究视野。马里奥·托莱斯教授进一步丰富了“美好生活”印第安哲学的当代内涵。他认为: 该理念并不限于哲学理论范畴, 更是一个颇具实践性的指导理念, 涉及社会、经济权利以及环境保护。另有学者从跨学科角度, 分析“美好生活”的学术意义, 如马格达莱纳·莱昂 (Magdalena León) 将其置于“人文情怀经济学”理论路径下, 进行了较为积极的论述。

“美好生活”并不局限于理念发展, 玻利维亚两任外长大卫·乔盖万卡 (David Choquehuanca)、费尔南多·瓦纳库尼以及厄瓜多尔前议长阿尔贝托·阿科斯塔 (Alberto Acosta), 都是行政领域的理念践行者。近年来, 中国学者对此也有了一定的关注。

我国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 多位学者对“美好生活”进行了理念性评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在《玻利维亚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一文中, 评述了“美好生活”入宪的积极意义, 指出, 社会提升了对印第安群体发展问题的关注。中央编译局靳呈伟在《拉美“美好生活”理论、实践与启示》中提出, 对拉美地区“美好生活”理念和实践的梳理, 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美好生活”的论述, 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添砖加瓦提供借鉴。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向骏在《拉丁美洲七讲》一书中认为, “美好生活”理念有助于地区国家医疗服务与文化权的提升, 是地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方旭飞在《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初探》一文中分析了作为发展模式的“美好生活”在厄瓜多尔“公民革命”中的实践。此前笔者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寻找“美好生活”》, 评述了政治理念“美好生活”对安第斯地区意义, 进一步推动了地区环境保护与民族文化遗产, 有利于印第安社群的社会融入。综上, 国内外观点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重提“美好生活”, 有助于民族文化发展; 其理念内涵, 值得现代科学研究 “美好生活”在具体国家的制度实践, 仍待时间考验。

拉美国家重提“美好生活”的目的在于:

如何既不过度美化, 又能将其中的哲学内涵合理展示给世人理解? 面对历史悠久与认同广泛的民族传统理念, 如何发挥其哲学内涵, 服务于国家发展与制度建设? 拉美地区, 作为集中了 33 个国家和十余个未独立地区, 是发展中国家集中连片地区。200 年前, 多数国家宣布独立并颁布各自的独立《宪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文化自觉的增强, 对于一个国家内部而言, 是逐步摆脱少数民族文化边缘化的过程; 亦是在全球视野中, 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关键。

## 二、“美好生活”印第安理念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制度性实践

在当代, 挖掘印第安传统理念现代化的意义, 不仅在于打破西方哲学在思想领域的垄断, 更在于在国家、民族概念下, 建立适合本国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制度。

近代以来, 受地区内、外部发展理论的影响, 拉美国家践行公平发展的制度性建设从未停止。1951 年, 欧洲社会党人创建社会党国际并发表《法兰克福宣言》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 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 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20 世纪, 欧洲社会主义理念推动了地区后发展主义与民族独立的政治实践。无论是阿根廷的正义社会主义、秘鲁阿普拉主义、巴西瓦加斯主义、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厄瓜多尔贝拉斯科主义、委内瑞拉 21 世纪社会主义, 又或者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古巴共产党等, 政治理论和政党实践皆丰富了现代国家发展理论的内涵。拉美国众主义的发展也渐成为区别于西方民粹主义的独立思潮。<sup>①</sup>

基于上述复杂的社会历史基础, “美好生活”于 2000 年首次见诸于报道, 在关于厄瓜多尔石油开采引发印第安人反抗的报道中, 媒体提出了建立个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共存的国家框架的解决建议。在尊重印第安人世界观, 尤其在尊重土地作为“帕恰妈妈”(中文可以部分理解为大地母亲) 的理解之上, 化解印第安人和国家能源、矿业开采间的发展性矛盾。印第安人将自然放在第一位的观念, 与当今环保理念不谋而合。其理论基础是: 人类不能离开土地而生的认知, 强调人

<sup>①</sup>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译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 (1951-1987)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3, 42, 42, 125 页。——转引自蒋锐 《拉美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价值观念比较》, 载《社会科学研究》, 2012 年 4 月, 第 23-28 页。

对环境的“依附性”属性，而非认识土地和资源的主人的私有性认知。这一研究的兴起，是希望转变拉美国家当前“物质激励”为主的思想，向崇尚精神与物质富足并重的理念转变。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国，首先从立法层面更新了国家基本法表达，并进行了具体政策性规划。

#### （一）两国“美好生活”理念入宪的法学解释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国家行为与性质的基础性法律。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两国，将“美好生活”理念写入《宪法》文本，体现了印第安传统理念对国家的基础性作用与规范性意义，是当代人权保护的地区性基本法探索。

2008年9月28日，现行《厄瓜多尔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并颁布实施。新宪法建立了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加强行政权、改革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基础上，增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权和选举权。在宪法文本中，“美好生活”理念主要集中在《宪法》第六章发展的制度及第七章“美好生活”制度两章。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障发展的具体途径。在这两部分中，厄瓜多尔确立了另类发展道路<sup>①</sup>的核心为注重生活质量、公正的法律体系、公众参与和恢复与保护环境等。此外，从法律角度，可将新宪法中规制的权利内容归为两类：一部分为肯定的权利范畴：如“美好生活”权（其中包括食品、健康环境、水、交流、教育、居住、健康权等）这些内容与传统权利内容基本一致。另一部分为否定的范畴：包括拒绝新自由主义、反对出口导向型资源开采发展模式，以《宪法》文本规定有别于他国的发展模式选择，表达了国家政策自主的意愿。

此次修宪的法理学意义主要有三：首先，确立了一系列“大自然的权利”，赋予大自然以独立法律人格，突破了传统法学权利主体为人，自然仅为使用权的客体概念。厄瓜多尔通过修宪，把保护自然权利，列于与基本人权保护同等的地位。这符合生态法学关于生态利益观念和生态权利义务的论述。通过基本法立法实践，提升了国家对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为进一步加强自然权的保护，厄瓜多尔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亚苏尼倡议》，希望以国际性金融援助，

换取无限期暂缓开采亚苏尼国家自然公园的石油资源。第二，将克丘亚语“Sumak Kawsay”写入宪法文本，这一尝试不仅具有立法意义，更具法律实效性<sup>②</sup>。以宪法条文为指导，厄瓜多尔政府制定并实施“美好生活国家战略”，是厄瓜多尔落实“美好生活”理念法律内涵的实践，涵盖国家法律、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的改革。第三，直接将“Sumak Kawsay”印第安原文写入国家宪法，不仅有助于保护民族语言与文化权利，更通过新法条本身，实现了多民族语言文化的法律保障（参见《厄瓜多尔宪法》第71条）。

2009年，玻利维亚通过新宪法的订立与颁布，以基本法形式确立“生活得美好”是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理念。新宪法增加了印第安民族人口基本权利保障的法律条文，民族人口权利的保护内容也更为具体。《玻利维亚宪法草案》先后于2007年12月9日、2009年1月25日和4月14日，分别获国家立宪大会、全民公决（61.8%的支持率）及国民议会投票通过，最终正式成为该国现行宪法。在宪法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等多个章节，规定了多项印第安人的专项权利（第30条至32条）、司法权（第190条至192条）和印第安人的自治权（第289条至296条）。

除将“Suma Qamaña”（西语“Vivir Bien”，中文译作“生活得美好”）以民族语言入宪外，玻利维亚还根据印第安人口比例超过50%的特殊国情，规定国家经济模式是多元的、其发展目标是提升生活质量，改善印第安人生活（宪法第306条）。在基本法中明确“Suma Qamaña”，是国家多元社会的道德-精神准则。上述基本法内容，有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与印第安传统理念的联系，明确了印第安理念在本国的根本性地位。玻利维亚宪法的基础，是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为代表的第三代人权体系。因此，相异于厄瓜多尔，修改后的《玻利维亚宪法》并未加入“大自然的权利”这一内容。

两国将印第安不同民族的共通理念“美好生活”或“生活得美好”写入基本法，表达了国家对民族文化权的重视，是对宪法学理念发展主动性、自发性的探索。这也为民族人口政治

<sup>①</sup> Eduardo Guynas: *El mandato ecológico - derechos de la Naturaleza y políticas ambientales en la nueva Constitución*, Quito, Abya Yala, 2009, p275

<sup>②</sup> François Houtart “El concepto de sumak kawsai ( buen vivir) y su correspondencia con el bien común de la humanidad”, América Latina en Movimiento, p26

权、经济权和社会权利的提升提供了基本保障。五权分立的新提法、“大自然”作为“权利”主体的表述，是否符合宪法的规范化表达，能否为宪法学体系接纳，仍有待商榷。

宪法内容的保障与实施，离不开具体法律与政策的制度建设，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通过不同的制度构建，不断完善“美好生活”政策具体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 (二) “美好生活”在厄瓜多尔的政治制度构建

90年代以来，厄瓜多尔面临同秘鲁战争、寡头政府镇压、自身腐败等问题，加之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社会中下层人士（特别是印第安人）的生活每况愈下。诚如巴布罗·达瓦罗斯(Pablo Dávalos)<sup>①</sup>所说：此时的印第安人运动，是资本主义新自由阶段危机的受害者。他们提出社会诉求并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希望建立反对这一理论的观念。其他社会团体也开始关注印第安人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态体系问题。这一系列社会现象激发了传统文化的复苏，“美好生活”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理念，指明了更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何塞·桑切斯·巴勒卡(José Sánchez Parga)<sup>②</sup>认为，美好生活(“alli kawsay”<sup>③</sup>，西语中的“vida buena”)并非是对传统毫无根据的臆想，而是根植于多个印第安民族内部的哲学认同。在厄瓜多尔，对“美好生活”的实践，以《厄瓜多尔宪法》规定制定的国家发展规划为核心。在施政过程中，政策重视工业化进程对农村美好生活建设的支持，追求公平前提下的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科雷亚政府时期，厄瓜多尔推行了三个五年期“美好生活”国家发展规划<sup>④</sup>。规划制定后，由国家规划委员会负责审议，论证规划的合宪性与民主性。通过协调部委间合作、公民参与聚合民族理念，由国家规划与发展部统一主持实施。

规划将“美好生活”作为国家基本发展目标，具化为12项国家保障标准<sup>⑤</sup>和9个分领域目标：1. 建立一个承认集体中有差异的社会；2. 人们希望在这里生活的社会；3. 推动社会平等、和谐作为共同生活的出发点；3. 保护宇宙的权利，保护人类生存环境；4. 建立社会、经济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5. 创建团结、合作的共存；6. 加强劳动者与其他群体的关系；7. 重建公共关系；8. 深化代议制、参与式和协商制民主建设；9. 增强国家民主、多民族和世俗社会(“laico”)建设。<sup>⑥</sup>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国家规划的公布在文化领域也做了有益的制度实践。文件以舒阿拉语(shuar)<sup>⑦</sup>、克丘亚语、西班牙语等多语言公布，并将厄瓜多尔重点保护的两种印第安语言置于首位。这体现了对少数人文化权利的保护。此外，该规划还提出了十余项财政管理新模式策略，通过后-石油时代“美好生活”的再分配原则，保障宪法规定的国家生态主义得以实现。

作为政治纲领，“美好生活国家规划”是厄瓜多尔政府寻求同华盛顿共识理论决裂的体现，力求远离发展理念中的不利观点，提出了如粮食主权等值得关注的内容。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拉美历史上存在很多法律实效性不高的案例，多是由于法律制订过程过于依赖西方法律体系构

<sup>①</sup> 巴布罗·达瓦罗斯(Pablo Dávalos)：经济学家，厄瓜多尔大学教授。发表过多篇关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安第斯国家改革以及拉美经济发展文章，参见：<http://alainet.org/active/25617&lang=es>

<sup>②</sup> 何塞·桑切斯·帕尔加(José Sánchez Parga)：哲学与人类学家。厄瓜多尔 Debate 杂志首任主任。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del Centr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CELA) de l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Ecuador, Quito, CELA)，CELA 创始人。

<sup>③</sup> Alli Kawsay，克丘亚语，指一个可能的、自身的、可以实现的乌托邦。不仅是现实的行为指引，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共同体及自然中的行为准则。参见：<http://aynintercultural.org/4.html>

<sup>④</sup> 2013年5月8日，厄瓜多尔政府在前两部五年期规划基础上提出更为具体与广泛的“2013-2017年美好生活国家规划”(El nuevo Plan Nacional para el Buen Vivir, período de gobierno 2013-2017)。在2013-2017年国家规划中，第二部分专门论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建设，提出建立具有多样性、和谐性、团结性以及与自然协调共存的公民社会的国家规划。同时，明确美好生活的具体标准时：生产模式的多样化与国家经济安全、人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具体包括医疗、教育、受尊重的劳动、良好的居住环境与房屋)。同时，建设公正、公众参与、文化多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sup>⑤</sup> 12项国家保障包括：1. 在多样化的前期下承认平等、社会和国家的凝聚力和一体化。2. 提高公民权的实效性。3.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4. 保障大自然的权利，促进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5. 保障主权与和平，参与国际及拉美地区的战略合作。6. 在承认形式多样化的前提下保障稳定、公平的工作(地位)。7. 加强公共空间、多文化交流场所及各种会晤的公共场所的建设。(Construir y fortalecer espacios públicos, interculturales y de encuentro común.) 8. 确定和建立国家对差异性的认同、多民族性的认同以及文化间关系认同。9. 保障权利与公正的有效性。10. 保障公众参与和政治参与的途径。11. 建立社会团结和可持续的经济体系。12. 建设美好生活民主国家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de la República del Ecuador: Plan Nacional para el Buen Vivir 2009-2013, El Ecuador, 2009, <http://plan.senplades.gov.ec>, P7.

<sup>⑥</sup>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de la República del Ecuador: Plan Nacional para el Buen Vivir 2009-2013, El Ecuador, 2009, <http://plan.senplades.gov.ec>, P7.

<sup>⑦</sup> 舒阿拉：(shuar) 亚马逊雨林地区的印第安民族。厄瓜多尔多语言国家规划各版本参见：<http://www.planificacion.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2/08/versi%C3%B3n-resumida-en-shuar.pdf>

建,却未能完全适应拉美社会发展进程所致。厄瓜多尔在基本法与国家规划上的制度实践有别于“水土不服”的西方制度照搬。其目标的实现,仍面临政党更替、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认同等诸多挑战。

### (三) “美好生活”在玻利维亚的政治制度构建

稳定的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前提,通过社会政策寻求国家民主进步是多数拉美国家政府的近似性选择。在玻利维亚,左翼政府选择了新的发展道路。莫拉莱斯总统提出了“共同体社会主义”(即“印第安社会主义”,又译“社群社会主义”),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生活得美好”国家规划。在莫拉莱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AS-IPSP)再次在总统竞选中胜出时,政府提出了《2010-2015年玻利维亚政府规划》。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多样、包容、平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让世界上所有人民“生活得美好”。这也是玻利维亚人民对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模式、西方文明消费观标准提出的有力质疑。

“它赋予‘多民族国家’这一国家构成特性以法律及政治制度内涵,根据‘团结融于多样性之中’的原则,承认多个民族、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和多种精神世界形式的存在,把社团组织纳入国家本身的体制之中,对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中的国家形态提出了不同观点。在法律、政策以及实践领域有所表现。”<sup>[2]</sup>

玻利维亚为落实“生活得美好”理念,制订了五年期国家发展规划的形式。莫拉莱斯政府将印第安理念寓于现代国家制度改革进程,以5项战略目标为导向:第一、扩大国家的职能作用;第二、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环保、提升自然资源附加值的生产部门;第三、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如国有、私人、共同体与合作等形式)有机参与生产环节;第四、实现首先满足国内市场,而后用于出口的生产;第五、努力做到对财富的公平再分配,减少不平等。<sup>①</sup>

在认识到工业化及科技转化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后,玻利维亚积极推动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资本-科技现代化规划。玻利维亚跳出固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观,提升各领域技术的应用水平,减少科技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成本。莫拉莱斯政府抓住了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的上升期,通过逆周期的财政政策顶住了国家赤字压力,利用历史以来较高的国际储备,力推社会发展。

回望玻利维亚“生活得美好”国家规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农业和工业发展。这主要得益于规划提出的农村发展和国家“工业大发展”(“Gran Salto Industrial”)<sup>②</sup>两项政策。

在农村地区,玻利维亚实现农村减贫、农业生产与农业保险、土地分配改革三个领域的进步。第一,农村赤贫人口直线下滑,社会不平等问题得以缓解。最明显的减贫时段为2005-2008年,从62.9%下降到49.2%。第二,在农业生产与农业保险方面,政府依据“生活得美好”农业促进规划,实施以减少生产风险,农业产品商品化等政策,将农业保险扩大到全国65万大、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覆盖204,6335公顷农业用地面积。其中,53.47%为油料作物(109,4257公顷);37.74%粮食作物(77,2389公顷)以及占8.52%的基努阿(又称:藜麦)<sup>③</sup>、土豆等其他作物(17,9689公顷)。第三,在土地分配改革中,中央与地方多级政府的土地划拨政策与配套财政政策,“已惠及了全国4682个家庭。在三年半的政府规划执行过程中,国家同比多分配土地95.8万公顷。”2013年,全国基本完成划归土地给集体和农民-印第安人共同体的预期。<sup>④</sup>

另一方面,玻利维亚将“美好生活”理念寓于工业发展中,以“工业大发展”政策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遵照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理念,发展国家工业现代化。在克里斯托弗·凯(Cristobal Kay)看来,玻利维亚政府现在

① Otto Colpari “El Discurso del Sumak Kawsay y el Gran Salto Industrial en Bolivia, Breve análisis del desarrollo rural del programa nacional de gobierno (2010-2015)”, *Revista Crític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Jurídicas*, Núm. Especial: América Latina (2011), [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 P4-5.

② Otto Colpari “El Discurso del Sumak Kawsay y el Gran Salto Industrial en Bolivia, Breve análisis del desarrollo rural del programa nacional de gobierno (2010-2015)”, *Revista Crític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Jurídicas*, Núm. Especial: América Latina (2011), [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 P3.

③ 基努阿: 秘鲁传统作物,发源于秘鲁安第斯山的“基努阿”(quinua),在植物学中称为“昆诺阿藜”,是一种高产且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人们将之称为“谷物蛋白之王”,其所含氨基酸最接近人类吸收水平,现代人正在时髦地开发这种未被充分认识的、无污染传统作物,它日益成为欧美餐桌上的“金谷物”。

④ Otto Colpari “El Discurso del Sumak Kawsay y el Gran Salto Industrial en Bolivia, Breve análisis del desarrollo rural del programa nacional de gobierno (2010-2015)”, *Revista Crític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Jurídicas*, Núm. Especial: América Latina (2011), [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 P9.

提出的发展战略是结构主义理论,具有改良主义、技术官僚等反封建、反垄断等特点,是结构性改革进程。也有学者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

对于玻利维亚正在经历的改革,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学者称之为“新农村主义”进程,也有观点认为,政策制定者,只将政策重心置于农村,推崇传统的“生产主义”,<sup>①</sup>过分关注农业、牧业以及林业生产活动,而忽视了客观现实以及农业、农民以及农业工作者面临的新挑战。<sup>②</sup>还有学者提出,玻利维亚今天的工业化道路远离了本国“生活得美好”理念,工矿业的发展仍难避免过度开采,原始村落共同体制度被破坏等问题,“帕恰妈妈”和谐发展的追求难以实现。<sup>③</sup>

上述两国在立法与行政领域的实践表明,“美好生活”作为发展观,是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矛盾的建设性探索。它并非如批评观点片面认为的那样,所有理念的构建只为了竞选总统。这一制度建设实践,是对和谐发展理念的有益探索。

两国的实践殊途同归。厄瓜多尔由于印第安人口较少,总统为经济学家出身,国家长期受美国发展模式影响。因此,科雷亚政府上台以来,对印第安人“美好生活”理念的实践着重于将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推崇“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并加以实践。玻利维亚总统,推行政策有赖于大量的国家印第安人口(该国印第安人口占总人口62.2%,印第安人口比例为拉美最高)及文化基础,理念的实践更趋于以还原“美好生活”理念为主旨,实践已恢复印第安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集中的农村地区为核心实现发展。两国的立法与行政实践有着相似性:都发端于印第安文化,通过拉美左翼政府及国家领导人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执行。以国内政府为主导,并接受了来自比利时、英国的智囊和机构性外部支持。

未来,随着两国政治进程的演进,“美好生活”理念的认同与政策延续性仍值得担忧。目

前,政府更迭对传统理念作为政策实践的消极影响已初现。厄瓜多尔新任总统列宁上台以来,由于与前总统、前党首科雷亚存在政党内部分歧,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国家新一期发展规划不再以“美好生活”为主题,科雷亚时期的多项有助于印第安社区发展的政策纷纷终止。不久的将来,玻利维亚也将迎来总统换届,现任总统根据当前《宪法》规定,已不能继续连任。地区政治“左右翼交替”的钟摆问题,已出现右翼执政的地缘政治影响效力,务实且代表中上层利益的右派政府,能否延续“美好生活”哲学思想,还有待于时间来证明。

### 三、对当前拉美“美好生活”理念的初步评价

新自由主义实践在拉美失败后,“美好生活”理念渐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补充和修正。这一过程,伴随着拉美原住民的社会主体地位提升。在寻找替代性发展方案的过程中,拉美人民发现了印第安理念的现代价值。民族发展观日渐获得地区主流社会的认同,并呈现国际化发展趋势。

值得肯定的是,拉美国家传承并发展印第安的民族观念,借此推动国家立法与政治经济政策的现代化进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世界上鲜有将内部民族理念提升为国家发展观,以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入宪法,从国家基本法层面加以保护的先例。同时,由于历史上“美好生活”仅仅服务于部落社会发展,将其从单个民族社会单位,扩展为适用于各领域、大面积、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理念,是充满挑战的。根据“美好生活”理念入宪的自然权,作为非公民的基本权利主体的合法性,还需法理学的进一步阐释。随着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总统换届与政府更迭,“美好生活”政治实践能否获得执政党的长期支持,仍是未知。

拉美地区的“美好生活”理念包含了多民族、自治、集体形式和共同体土地所有制与经济

<sup>①</sup> 参见: [https://www.google.com.hk/#newwindow=1&safe=strict&q=productivismo&oq=productivismo&gs\\_l=serp..12..0i13j0i13i30l4j0i30j0i13i30l2j0i30j0i13i30.160753.164119.10.170352.13.10.0.2.2.0.289.1098.4j2j2.8.0...0.0...1c.4.12. serp.J3RmH5\\_EBPI&bav=on.2,or.&bvm=bv.46471029,d.dGI&fp=b1b59a044b63dabd&biw=1280&bih=645](https://www.google.com.hk/#newwindow=1&safe=strict&q=productivismo&oq=productivismo&gs_l=serp..12..0i13j0i13i30l4j0i30j0i13i30l2j0i30j0i13i30.160753.164119.10.170352.13.10.0.2.2.0.289.1098.4j2j2.8.0...0.0...1c.4.12. serp.J3RmH5_EBPI&bav=on.2,or.&bvm=bv.46471029,d.dGI&fp=b1b59a044b63dabd&biw=1280&bih=645)

<sup>②</sup> Otto Colpari “El Discurso del Sumak Kawsay y el Gran Salto Industrial en Bolivia, Breve análisis del desarrollo rural del programa nacional de gobierno (2010-2015)”, *Revista Crític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Jurídicas*, Núm. Especial: América Latina (2011), [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 P8.

<sup>③</sup> Otto Colpari “El Discurso del Sumak Kawsay y el Gran Salto Industrial en Bolivia, Breve análisis del desarrollo rural del programa nacional de gobierno (2010-2015)”, *Revista Crític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Jurídicas*, Núm. Especial: América Latina (2011), [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http://dx.doi.org/10.5209/rev_NOMA.2011.37934), P6

原则，推动了拉美社会的理念发展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sup>①</sup>地区社会发展恰恰需要的是“美好生活”理念中的集体认同观念，这种对团结、集体、劳动的尊重，源自对自然的尊重，它契合了当今社会发展理念。拉美的“美好生活”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遥相呼应。实践证明，为解决人

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改变不合理发展模式，中国与拉美国家需积极推进人类文明互鉴，共同探索人-自然-社会多维和谐的“美好生活”。充满理性的哲学观点不应以是否盛行一时为评判标准。拉美各族人民，从未停止过追寻“美好生活”的脚步；同样，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未曾停止过探索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索飒.当影子登上历史的舞台——拉美印第安人的觉醒[J].香港传真 2006 ( 60) .  
(2) 莫妮卡·布鲁克曼.马萨译.文明与现代性: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运动[J].拉美研究 2009 ( 5) : 43.

##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Challenges of the Indian Concept of “Good Life”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Case of Bolivia and Ecuador

HAN Han

(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In Latin America , the concept of “good life” originated from indigenous traditional culture. Recently ,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chosen the path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which has led to constant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onsumerism and Indian traditional ideas ,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been intensified. In this regard , Latin American indigenous people who used to be regarded as social “problems” have propos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good life” to solve modern problems. That is , to realize the prosperity of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orld through multiple balances and harmon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human community. Historically , this idea gained a widespread support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Andean re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aboriginal people , which is named as “good life” ,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 and some Andean countries have already practiced it in lawmaking and public policy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s still full of challenges.

**[Key words]** “good life” basic rights; constitution; Latin America; Indian culture

(责任编辑 红 梅)

---

<sup>①</sup> Henry Chiroque Solano & Valeria Muteberría Lazarini: *Procesos de construcción de otras alternativas: desarrollo y planteamiento de la Economía Social Comunitaria en América Latina* , Revista de Economía Pública , Social y Cooperativa , edición electrónica: 1989-6816. España , 2009 , p147 Resumen.